

苏维埃中央政府培育干部的最高学府

□ 唐 雷

在江西瑞金沙洲坝镇西南部的大布村，曾经并排矗立着五栋简陋而大气的茅草土房，它们就是苏维埃中央政府培育干部的最高学府——苏维埃大学的校舍。毛泽东、瞿秋白先后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曾亲自为这里的学员授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苏维埃大学为中央苏区各级政府培育了大批骨干，为根据地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党的干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因应革命形势需要而举办

1933年二三月间，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打破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这场重大胜利使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两大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队伍也随之迅速扩充壮大，总人数超过8万。根据地治辖范围的扩大、苏维埃政权建设各项任务的增加，以及面临国民党军新一轮“围剿”的威胁，迫切需要中央苏区在短时间内集中培育一大批优秀干部，“这不是几十几百人的事，而是要有几千几万人继续供给到各个工作的战线上去”。

1933年8月1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八次常委会在瑞金召开，会议指出：中府（即苏维埃中央政府）各部都在办训练班，为着集中领导，统一教授与学习的方向起见，决定开办苏维埃大学。苏维埃大学委员会由5名委员组成，分别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沙可夫、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林伯渠、内务人民委员部代理部长梁柏台以及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潘汉年，其中毛泽东亲自担任校长，沙可夫任副校长。中华苏维埃政府对苏维埃大学高度重视。

1933年8月21日，苏维埃大学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确定了建校、招生、开学等事宜。随后，在瑞金沙洲坝开始修建校舍。学员同工人一起紧张施工，以松木、杂木和毛竹等材料搭建起五栋并排的茅草土房。以松木为房柱，用松板合围四面并加以钉固即为墙体，墙上开有可以活动的小窗户，每栋房子中间再以土砖和竹片分隔成五到六个小房间，就组成了学生上课、住宿的场所。校舍内学习和



苏维埃大学旧址

生活设施因陋就简，将石头摆齐作为板凳，将木板横搭成为课桌，将竹片平铺是为床榻，被学员们亲切称为“茅草房中办大学”。

围绕苏维埃建设安排教学

1933年9月初，苏维埃大学正式开学，分为普通班（预科）与特别工作班（本科）。前者以文化程度较低的学员为招生对象，以文化补习为主；后者设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工农检察、教育、内务、劳动、司法等8个专业班（1934年春增设外交、粮食两个班）。对于入学条件，《苏维埃大学简章》明确年龄在16岁以上，不分种族和性别，有过苏维埃政府或党、团、群众团体半年以上工作经历，能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能看懂普通文件，均可入学。修业期限依实际需要决定，其中本科不少于半年，预科由学生入学文化程度决定。可见，苏维埃大学的办学既突出专业特点，又紧贴苏区建设实际，极具灵活性。

1934年4月，瞿秋白接替毛泽东任苏维埃大学校长，徐特立任副校长。为了纪念英年早逝的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中央决定将苏维埃大学更名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1934年4月1日，在瑞金沙洲坝中央苏府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校长瞿秋白和新任的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出席典礼。瞿秋白在报告中强调苏维埃大学的办学目标是“供给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干部人材”。张闻天围绕办学中心任务，号召学员努力学习怎样领导革命战争、怎样改善群众生活和保护工农利益、怎样管理苏维埃政权和

自己的国家。

苏维埃大学教学安排非常精当。课程包括苏维埃工作的理论、实际问题和实习三项，注重对政治、文化以及与政府各部门有关知识的学习。整个教学过程服务于革命事业需要，贯彻知识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全体工作人员和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学校教员分正教员和副教员，正教员负责各科的领导及教授，副教员辅助正教员教学工作，帮助其搜集教学资料，编辑提纲，并辅导和检查学员功课。中华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非常支持苏维埃大学的教学工作，许多高级干部担任了学校兼职教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林伯渠、陈潭秋、吴亮平等都曾到校授课。

立足提高本领坚持学以致用

苏维埃大学学制短，而许多学员文化程度不高，为了使他们在较短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掌握知识和提升本领，学校领导 and 教员立足学员知识基础，在提高教学质量上下功夫。

毛泽东和张闻天考虑到许多学员文字功底差、做笔记困难的实际，他们将自己的授课内容编成教材方便学员消化吸收，《乡苏怎样工作?》《区苏维埃怎样工作?》两篇文稿便是他们的讲义，后来印成小册子作为基本教材，受到学员们普遍欢迎。瞿秋白教学经验丰富，曾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上海大学、莫斯科列宁学院任教。主持苏维埃大学工作后，瞿秋白对政治教育每

一节课程如何去讲、每一次讨论题目如何设置都作出原则指示。他本人授课结束后，往往有很多学生围过来问问题，他都耐心给予解答或者启发学生的解答思路。徐特立在担任副校长后对学员培训倾注大量心血，在给教育专业班授课时，他带领学员到瑞金官圳口列宁小学开展现场教学，教学环节包括了解办学情况、随堂听课、分享感受、点评教师授课等。正是坚持立足学员实际，苏维埃大学的授课成效非常突出。

除了理论知识学习，苏维埃大学坚持学以致用，引导学员投身到火热的苏区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苏维埃大学师生积极响应中央人民委员会厉行节约、支援革命战争的号召，为了节省开支，学校的教员、行政人员和学员一起动手开荒种菜，发展生产，解决各种经费问题。1934年3月24日，《红色中华》第166期专门报道了苏维埃大学的实践活动，“沈泽民苏维埃大学全体工作人员及学生，目前决定节省，伙食公费方面，均照本报号召，并决定不用一个运输员，挑煤挑菜，均由自己动手”。通过节省运动，苏维埃大学实现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并且使学员深入了解群众、密切同群众的联系，“深刻地了解到目前战斗的环境”，提高了思想觉悟和战斗力。此外，学校还组织学员慰问红军和帮助其家属耕田，参与查田运动、选举运动以及宣传活动等实践活动。在学员毕业离校前，徐特立组织学员到中央苏区模范县兴国，亲眼见证轰轰烈烈的成人扫盲运动和小学义务教育普及情况，使他们在生动的实践中接受教育、受到鼓舞。

1934年上半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接连失利，苏区范围日益缩小。1934年7月16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苏维埃大学整体并入马克思主义学校。在不到一年的紧张办学历程中，苏维埃大学先后培养了1500余名学员，为中央苏区各级政府输送了一大批拥有较强政治素养和专业特长的优秀干部、急需人才，为推动革命事业前进发挥了重要作用。

红色记忆

文脉悠悠话扶风

□ 李 蔚

曾有人在网上征集中国最好听的地名，我的家乡扶风屡次上榜。初见字面，似有杨柳在风中摇曳之意，颇有楚楚动人之感。其实，这个地处关中西部沃野之中的小县城之所以名扶风，与它深厚的历史息息相关。西汉时期，这里属于三辅之一的右扶风，以“扶助京师，以行风化”而得名，唐时设为扶风县。扶风，流淌着悠悠文化之脉，一代一代传承至今。

小时候，外婆家毗邻扶风博物馆，它在明代扶风城隍庙的基础上建成。这个古香古色的庙宇院落，承载着我童年美好的回忆。院子的长廊里，有两个孩童样式的古代石子，是我最好的朋友。每当我有开心或悲伤的事儿，他们总是安安静静、不急不躁地听我倾诉。小小的我喜欢坐在青石台阶上，抬起头看朱红色的柱子笔直而坚定，撑着紫色的屋顶，檐角弯弯地翘起来，如同小鸟展开翅膀，努力向蔚蓝色的天空伸展。这一切，像极了一幅优美的古画。

也许因为这古雅环境的影响，长大后我外出求学，选择了古典文学专业。在文学的世界中，我常常与扶风惊喜相遇。《诗经·召南》里，有一篇怀念西周贤臣召公的《甘棠》，而扶风有一召公贤，便因纪念召公在此地设馆讲学得名。出自扶风氏氏家族的班固撰写了流传千古的《汉书》，《汉书·艺文志》中对于小说源流的认知，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绕不过

去的重要一环。“马革裹尸”的成语，蕴含着扶风人氏汉代伏波将军马援的典故，充分展示了他英勇善战、致命沙场的男儿气概。南北朝时期，扶风才女苏惠在织锦上绣出回文诗《璇玑图》，将对丈夫的无限思念与婉转深情，化进这840字变幻而成的几千首诗中。李白流落吴地时，受到了扶风籍豪士的热情款待，他深受感动，在《扶风豪士歌》中大加赞颂“扶风豪士天下奇，意气相倾山可移”。北宋嘉祐年间，苏轼路过扶风县城南部的飞凤山，见奇峰孤寺，风景怡人，随即赋诗“远望若可爱，朱栏碧瓦沟。聊为一驻足，且慰百回头”，将扶风的秋日美景永远定格在了《扶风天和寺》的诗篇之中。

不只在学校的书本里，于行走他乡的不经意间，我也与扶风不期而遇。一次参观上海博物馆时，我发现这里的镇馆之宝——大克鼎旁边的指示牌上，写着“清光绪年间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村出土”。我透过玻璃橱窗，凝视着大克鼎好久好久，好像拨开了历史的尘烟，感受到三千多年前在家乡那场隆重的祭祀中，作器者“克”对于祖父由衷的崇敬。大克鼎静默不语，却深沉而有力量，传递着中华礼制文明的庄重与典雅。那一刻，我在他乡与故乡重逢，心中涌起浓浓的乡愁。

暑假时，我回到扶风，在家乡的法门寺博物馆实习，为四方游客讲述

这一方土地的辉煌传奇。法门寺地宫出土有众多大唐珍宝，其中就有13件秘色瓷。在为游客讲解时，我喜欢引用晚唐诗人徐夤描绘秘色瓷的诗句“巧制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游客们左瞧瞧右看看，有的还要踮起脚尖，或是微微蹲下，为的就是找到最佳光位，亲眼见证秘色瓷碟底部那一泓清亮亮亮的春水。每次听到游客感叹秘色瓷“无中生水”的神奇，见到他们对唐文化发自内心的喜爱时，我都十分开心，感觉自己为弘扬传统文化作了一点贡献，也为家乡丰富的文物资源感到自豪。

工作后每次回扶风，我都感受到家乡的巨大变化。记忆中20世纪90年代初，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县城有一条七星河，是居民们寻找自然野趣的绝佳之地。夏日傍晚，天边晚霞绚烂，蜻蜓在河道边自由地飞舞，七星河畔飘荡着欢声笑语。然而渐渐，居民们不愿意去七星河了。由于附近的造纸厂将废水排放进河里，水面上泛着厚厚的浮沫，周围草木零落，蜻蜓更是难觅踪影。

如今的七星河经由治理改造，已经建成七星河国家湿地公园。这里重现了一派宁静的田园风光，自然景致与人文内涵相得益彰，民间文化与生态文明和谐共融。“海棠春晓”“在水一方”“伏波鉴影”等特色景观遍布其中，小径旁的观赏牌上，刻着清新雅致的诗词佳句。游览途中，我遇到一

位戴着墨镜的老大爷，正端坐在一座八角凉亭中，全神贯注地用二胡演奏着一首秦腔曲牌。我一扭头，河中亭亭的荷叶上，正立着一只蜻蜓，似乎也被美妙的乐声所感染，在一旁凝神聆听。时隔多年以后，我终于在七星河，与这可爱的小生灵欣喜重逢。

我沿着七星河国家湿地公园一路前行，离扶风新区越来越远。以前回家，车总是要经过好几个盘山大转弯，一阵心惊胆战之后，才能到达位于盆地里的扶风县城。小城虽美，却受制于地形，难有新的发展空间。千禧年之后，扶风开始往东北边的塬上搬迁，建成规划有致的新区。2022年，扶风“牵手”国内的大型现代化企业，发展驶进了快车道。身处现代化进程中的小城，我那时时感受到这里氤氲而出的文化气息。新区中心的大转盘处，高高矗立着一座“大鼎”的青铜器标识，上书“仁义礼智信”，它不仅是这方土地深邃历史的见证，更意在以传统文化助力于扶风的现代文明建设。

扶风，不忘过去，亦活在当下，以积极的姿态面向明天！

自得园

范仲淹一生乐善好施，有许多高风义举，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创建义田义庄。据记载，范仲淹一生置办了多处义田义庄，分别在苏州吴县、涪州长山、商丘宁陵等地，其中苏州范氏义庄最为典型和完善。

义田是指赡养族人或贫困者而置的田产，建义田需要耗费资产和大量精力，且不以回报和获利为目的。北宋政治家钱公辅曾著文《义田记》，记载了范仲淹购置义田的经过，赞扬了他乐善好施、广利众生的精神。范仲淹为什么要建义田义庄？这与他从小的苦难经历以及他传承的儒家思想是分不开的。

史载，范仲淹的身世非常凄惨，两岁的时候，父亲病逝，母亲改嫁涪州长山朱氏，他也改姓为朱。他年纪稍大后便拜别母亲，一个人住到醴泉寺读书。读书期间，生活极为困苦。多年后，范仲淹回忆道：“……旧日某修学时，最为贫窶，与刘某同在长白山僧舍，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齑十数茎，酢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即每天煮两升粟米粥，冷却后用刀分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为食，然后将腌菜、酱菜之类切成碎末，加半杯醋，少许盐，烧熟拌粥，如此苦读三年。这就是范仲淹“划粥断齑”典故的由来。这番艰苦的生活经历和磨炼，使他后来始终能保持清廉律己的品质，并且同情贫苦百姓的境遇。

范仲淹自幼熟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曾师从儒学名师戚同文，戚师为人纯质尚信义，“人有丧者，力拯济之。宗族间里贫乏者，周给之。冬月解衣裘与寒者。不积财，不营居室”。他曾经的上司张纶也是豪侠任气之人，为人恕，喜施与，在江淮一带，见漕卒冻饿道死者众，便“推奉钱市絮絮千数，衣其不能自存者”。这些前辈对范仲淹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由此也非常推崇行善之人。五代后周时人窦禹钧修身积德，帮助贫者，开办“义塾”，终得善果，范仲淹专门写了《窦谏议录》一文，赞其品行。

皇祐元年（1049年）正月，年逾花甲的范仲淹赴杭州上任的途中经过苏州，目睹了家族中一些贫困成员的生活状况甚为痛心，想起自己早年的孤苦经历，不愿族人再受到孤苦的困扰，欲帮助解决此问题，便与自己的兄长范仲温商讨创立义庄之事。

不久，范仲淹在苏州的长洲、吴县购置良田十余顷，作为族中公产，后又买下离城区很近的田地千亩，设立义田且置义庄，义田上获得的米则为义米。范仲淹将义田每年出租土地所得的租米分给族中各房，按照人口数量分给衣食，分发用于婚丧嫁娶等事宜。还设立义宅供范氏家族聚族而居，并建有义塾供家族子弟接受教育。

为了避免“因人废事”的情况发生，皇祐二年（1050年）范仲淹深思熟虑后，亲自制定规则共十三条。如在义庄内设立专门的掌管人，这些人都是由族人从各房中推举出来的，需要接受各房的监督，若行为有失公允，则可要求掌管人赔偿相应米粮。规定也注重公平，体现差异化的关怀，如遇到丧事，按年纪和辈分的不同领取钱财等。

范仲淹将这些规刻在木板上，挂于祠堂的墙壁上，要求族中所有人必须遵守。但他去世后，一些管理者带头破坏规矩，使许多族中子弟陷入无所依靠的境地，他的次子范纯仁便上请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得到官府介入协助后，情况得到扭转，义庄也成为官府承认的组织。

范氏后人继续对义庄规矩进行废除、修订、增补，仅北宋时期的

范仲淹的义田义庄

□ 江晨颖 何兵兵

修改就有十次。南宋时期虽然经历长期的战火，但范氏家族子弟也努力地维系范氏义庄，续订规矩。尤其是增加了许多约束性的内容，如“限制族人在规定的粮钱外要求额外的支給”“家族中的尊长，不得倚仗辈分插手管理事宜，不然就报官府处理”“家族中若有强奸、盗窃、赌博、斗殴等行为者，罚米一年，若再犯则开除族籍，永不支米”……随着时间的推移，规矩包含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从宗族管理到个人行为规范，从经济生活到日常生活，包括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

范仲淹一生清正廉洁，大部分收入都用于修建义田义庄。因此，他虽位高权重，但“贫终其身”，去世的时候，家里没有钱财为他办像样的丧事。范仲淹的儿子们继承了父亲的志向，除了早逝的长子，其他三个儿子都参与了义庄的事务。次子范纯仁更是范仲淹诸子中对义庄投入精力和财力最多的人。范纯仁曾两度出任宰相，但依旧主张廉洁家风，自己也做到勤俭如一，所得俸赐，都用于义庄的发展，将义庄扩大至三千亩。南宋楼钥在《范氏复义宅记》中感叹，“天佑范氏，三子鼎贵，皆以宏才高道上继父风，后人得维持凭藉，以保其家”。其后的范氏后人也多热心义庄事务，使得范氏义庄能代代相传，历经宋、元、明、清，直到民国年间，仍可以正常运转，延续了八百余年。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义田义庄的善举正是范仲淹这种忧乐观念的一种体现。范仲淹心怀世人、济贫扶难的人格品行值得后人敬仰。



范氏义庄旧址（今苏州市景范中学）